

国际责任与大国战略

第

八

辑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责任与大国战略

第

八

辑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责任与大国战略/潘忠岐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8辑)

ISBN 978-7-208-08093-5

I. 国... II. 潘... III. 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国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6144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八辑 •

国际责任与大国战略

潘忠岐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259,000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093-5/D · 1427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编前语 /潘忠岐 1

中国的角色定位

中国与世界秩序：意象差距的变动及其寓意 /潘忠岐 6

中国的国家身份、国际地位与战略定位 /张家栋 21

权力与责任：冷战后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徐正源 40

建构一个情境现实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的冷战后安全政策 /Camilla
T. N. Soerensen 56

中国的责任指向

负责任大国：理论、历史与现实 /邢 悦 詹奕嘉 80

评析“中国责任论” /牛海彬 94

中国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强度与来源

——基于六城市民意调查的经验发现 /卢春龙 田野 109

将地区化与冲突防治联系起来 /Mikael Weissmann 127

中国的战略思考

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 /陈玉刚 147

结构型战略能力与中国国家安全 /唐永胜 佟明翔 160

中美相互依赖的结构

——理论分析的框架 /余万里 170

后冷战时期中国在东北亚的外交政策 /李镐铁 183

中国的外交转型

中国的外交新思维与外交理论的发展 /赵可金 199

中国元首外交的法理地位与实践空间 /胡 勇 218

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蒋昌建 沈 逸 231

构建中国的外交哲学刍议 /张志洲 246

编前语

潘忠岐

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国际责任、对外战略和外交转型等问题迫切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的研讨。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20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国际青年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与会。这里,我们选取部分会议论文以及因不同原因未能与会的相关论文构成本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以飨读者。

一、中国的角色定位

四位学者重点分析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问题。潘忠岐从意象差距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其性质趋于易调和,程度趋于降低,变动趋势趋于平缓 and 缩小化。中国相应地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转变为批评者和利用者,并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和塑造者。就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而言,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修正国,而是准现状国。

张家栋则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当代国际体系,但是在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方面仍然是一个体系外国家;中国的实力正在增强,但是在反映国家实力的经济优势、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仍然是一个弱势国家。所以,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却不是一个强国。由于发展中的一些制约性,中国也不应该将自己定位为霸权国家的挑战者。

徐正源提出,冷战结束以后,中国适时地开始了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具体表现为新安全观、文明多样性等一系列新外交理念的提出和对大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多边国际机制外交实践的展开。但是,中国负责任大国

身份的建构还面临着诸多的外在两难和内在紧张。

Camilla Soerensen 就如何分析冷战后的中国安全政策问题,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以及由此而来的一般假说和研究假说。她试图建构一个所谓的情境现实主义观点,并用它来分析冷战后中国安全政策的发展,探讨单极之下崛起国安全政策的发展问题。

二、中国的责任定位

就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四位学者的文章给出了他们的独特分析。邢悦和詹奕嘉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做“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对自身身份的重新定位。在理论上,负责任大国至少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兼具强大的软硬实力,二是愿意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稳定和国际秩序。在现实中,中国想要成为负责任大国,还需要加强自身的制度和文化建设,为维护 and 稳定国际秩序奉献自己的力量,防止陷入“经济决定论”和极端民族主义。中国要达到这一目标依然任重道远,但一旦实现便将对世界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

牛海彬提出,国际责任是国家作为国际社会成员属性的派生物。面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力量,“中国责任论”渐渐成为国际体系内主要国家的对华主流态度,从而构成对中国国际角色的外部期待与约束。

卢春龙和田野利用第二次“PEW 全球态度工程”中关于中国六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说明经济相互依赖会在一个社会内导致对经济国际主义的积极态度。他们发现,在中国社会内部,经济国际主义主要从诸如文化优越感、现代性意识和生活满意度等公众的主观倾向中获得支持。教育、年龄与海外亲友联系等客观的社会人口统计属性也会显著影响公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

Mikael Weissmann 通过分析地区化的四个表现(文化和社会地区化、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跨域微观地区化、非正式网络)探讨了东亚安全环境下地区化与冲突防治之间的可能关联。通过分析案例,他发现,地区化的所有四个方面在东亚都具有冲突防治功能,而且四个方面一起发挥作用可以达到最大的冲突防治效力。

三、中国的战略思考

在这部分选取的几篇论文中,陈玉刚的文章讨论了软实力建设与国际关系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软实力概念中所包含的价值意义和工具意义的区分,指出软实力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挖掘其价值意义,特别是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来说,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主要有发展、稳定与和谐。作者提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价值体系化、制度化,进而可操作化,并作学理上的构建与探讨。

唐永胜和佟明翔的文章从国家与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关系的角度,将国家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和结构型战略能力两种类型。国家的结构型战略能力主要与其在国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和态势所决定,是国家运用源于国际体系的资源与力量,应对各种安全问题,实现安全利益的能力。他们认为,维护新世纪的国家安全,中国不仅需要大力增强自身在经济、军事等各领域的要素型战略能力,也需要注重国际体系所产生的结构性影响,趋利避害,在体系的结构及其变动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余万里的文章在概要梳理有关论争的基础上,试图建构一个分析当前中美关系的理论框架。文章指出,中美关系的现状在根本上取决于双边关系的三个基本特性:大国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他认为,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包含经济全球化、地缘战略、国内政治三个分析角度。

李镐铁的文章认为,冷战后中国在东北亚的外交政策主要取决于四个关键因素:实力政治或均势政治、经济相互依赖、民族主义和政治领导。这些因素如何发挥影响以及如何相互组合,将决定中国外交政策走迁就/合作路线还是独断/对抗路线。中国的实力政治是更多地受制于经济相互依赖,还是更多地被民族主义行为所支配,将使中国外交政策摇摆于合作和独断路线之间。然而,鉴于中国领导层内部存在一种坚定不移的共识,即为了政治合法性必须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作者预言,中国领导层更倾向于推行稳健的实力政治,将实力政治置于均势政治的指导之下,并使之受制于日益提

升的经济相互依赖。因此,迁就/合作的行为路线更有可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常规路线,尽管该路线在中国核心国家利益面临挑战时仍有可能摆向独断/对抗的行为路线。

四、中国的外交转型

关于中国的外交转型和外交发展,几位学者从理论和实践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赵可金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历史任务、国家利益的排列次序、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外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决定中国必须在外交观上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对外交事务的要求。近年来的中国外交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在外交理念中注入了和平发展外交、不结盟外交、多边外交、外交为民以及在外交战略和政策层面的众多新思维。因此,今后的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应当结合时代条件所发生的客观变化,积极推进外交理论的创新和研究,逐步建设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体系。

胡勇从元首外交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外交的新发展。他认为,作为中国国家元首的国家主席,通过首脑互访、首脑热线、派遣特使等多种形式,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中国元首制度的嬗变来看,虽然国家主席的职能定位有过不同程度的调整,但其法理地位长期以来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其实践空间则在不断扩展。

蒋昌建和沈逸从媒体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他们提出,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发挥五大主要功能:党和政府的“喉舌”;知识精英对外交政策进行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的“麦克风”;不同群体之间就外交政策进行辩论的“竞技场”;对决策群体施加压力,以缩短决策反应时间的“加速器”;为普通民众提供能够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

张志洲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问题。他认为,在传统上中国虽然有许多关于外交的哲学观念,但一直以来缺乏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外交哲学。而如今正值中国崛起,构建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并具有外交理念基础性、世界观系统性以及长期稳

定性的、新型的中国外交哲学,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他回顾了国内学者有关外交哲学或中国外交哲学的文献和概念认知,指出外交哲学实质上是国家政治哲学的延伸,即国家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中的体现。

客观地说,中国的角色定位、国际责任、对外战略和外交转型等都是常新的重大问题,本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选取的论文无论如何都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十分令人满意的解答。我们不仅要继续就这些问题做更全面、更深入的探讨,而且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我们的行列,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

潘忠岐

2008年8月

中国与世界秩序:意象差距的变动及其寓意

潘忠岐

【内容提要】 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是判断该国对世界秩序态度和与世界秩序关系的重要视角。意象差距的性质、程度和变动趋势可以通过考察一国一定历史时期内,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加以判断。建国以来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其性质趋于易调和,程度趋于降低,变动趋势趋于平缓 and 缩小化。中国相应地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转变为批评者和利用者,并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和塑造者。因此,就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而言,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修正国,而是准现状国。

【Abstract】 A nation-state's general image of the world order, along with its dynamic image gap,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rom which we can judge this country's attitude toward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order. The nature, extent, and changing tendency of the image gap toward the world order could be defined by examining a country's participations in, benefits from, and impacts on the world order during a historical period of time. Based on this approach, we can argue that, in general, China's changing image gap toward the world order tends to be increasingly more reconcilable in nature, lower in extent, and narrower in tendency.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1949, China has accordingly transformed from the world order's antagonist and revolutionist to a critic and advantage-taker, and further to today's proactive supporter and shaper. In terms of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order, China is thus no more a revisionist state today, but rather a quasi *status quo* power.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显著成绩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取向问题,诸如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是现状国还是修正国,中国能否被现行国际体系所容纳等,一直是国内外学者所热衷于研究的课题。^①其中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中国实力上升或由此产生的权力转移可能带来的影响,还在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中国一向倡导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很多学者据此把中国界定为旨在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的修正国。然而,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不满和批评与一国究竟遵循修正路线还是现状路线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却没有得到严肃的理论探讨,其中的互动机理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本文试图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一视角,分析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

一、意象、意象差距的变动及其寓意

国家行为体与世界秩序之间的互动,是通过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的。本文的意象是指一国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评判、理念和构想。意象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反映世界秩序实然状态的现实意象(这与世界秩序的客观现实可能未必一致而存在某种程度的“错位”),另一种是反映世界秩序应然状态的理想意象,并且两者之间或多或少总是存在不一致,这里姑且称之为意象差距,因此,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常常是矛盾的统一体。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既反映国家与世界秩序的基本关系,又决定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态度。

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和意象差距,虽然在短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长时间内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或

① Rex Li 非常系统地比较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解释和分析。Rex Li, "The China Challeng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November 1999, pp. 443—476. 有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参见 Avery Goldstein, *R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太平洋学报》,2004 年第 2 期;郭树勇:《论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太平洋学报》,2005 年第 6 期。

者不同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往往对世界秩序具有不同的意象和意象差距。正是意象差距的存在和变动,才为一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态度和方式参与世界秩序的创建、维护与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并因此使“世界秩序才有了生命力,才有了新旧之分”。^①

概括而言,意象差距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两种变动趋势,一种是意象差距扩大化,一种是意象差距缩小化。大多数国家(大概除中立国外^②)意象差距的发展变化客观上都包含这两种不同的变动趋势,并从而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呈波浪式运动。意象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变动的国家一般倾向于要求从根本上颠覆和变革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与规范,这类国家通常被称作“修正国”、“非现状国”或“挑战国”。而意象差距呈缩小化趋势变动的国家一般倾向于要求维护和延续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与规范,这类国家通常被称作“现状国”。^③因此,意象差距的变动趋势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一国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对世界秩序持何种态度的重要标尺,并有助于我们把握该国与世界秩序的基本关系。

但是,实际上,任何一国意象差距的变动轨迹(不论扩大化还是缩小化趋势)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线式的波动。换言之,一国在某一时点上对世界秩序的态度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夹杂着修正和现状两种取向。只有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态度才呈现某种连贯一致的或修正或现状的取向。因此,重要的不是在某个时点上界定一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和意象差距、对世界秩序的态度,以及与世界秩序的

① 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② 本文用中立国指代那些对世界秩序保持中立立场和中立态度的国家,与国际法界定的完全置身于国际战争之外的中立国并不完全一致。中立国在参与世界秩序创建、维护与变革的意义上是一个特例。它们并不积极参与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是中性的,它们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情况是不确定的。中立国的最大特点就是世界秩序保持中立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明确的意象,不存在意象差距,因此,意象差距的变动及两种变动趋势并不适用于中立国。

③ 相关区分,主要参见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0, p. 2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相关文献综述和关于“现状国”与“修正国”区分标准的详细讨论,参见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关系,而是从长时段上确定其变动趋势。

而且,即使一国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对世界秩序具有相对稳定的修正或现状取向,这种取向也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世界上鲜有纯粹的修正国(认为世界秩序绝对不合理,现实意象与理想意象根本对立),也鲜有纯粹的现状国(认为世界秩序绝对合理,现实意象与理想意象完全符合)。在现状国和修正国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变动的区间,所有国家都可以沿着这个图谱进行排列和定位。出于进一步区分的需要,我们可以将位于图谱中央的称之为中立国,一般对世界秩序持中立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对世界秩序并没有明确的意象,也不存在意象差距。位于图谱一侧的为趋向修正国的准修正国(或有限的修正国),准修正国倾向于认为现行世界秩序比较不合理,或正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位于图谱另一侧的为趋向现状国的准现状国(或有限的现状国),准现状国倾向于认为现行世界秩序比较合理,或正变得越来越合理。

二、意象差距变动的动因、途径与判断

意象差距之所以会发生变动,是因为除中立国外的所有国家主观上都倾向于缩小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每个国家都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希望能够从世界秩序中受益,并希望能够影响世界秩序,使之于己有利,或者至少不会于己有害。但国家在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缩小意象差距的努力客观上未必都能如愿以偿,缩小化动机带来的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因此,意象差距的变动会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

国家缩小意象差距的途径不外乎两种:其一,改造现行世界秩序使之符合理想意象;其二,改变自己对世界秩序的认知使理想意象适应现实意象。就第一种方式而言,在现行世界秩序基本结构和规范的框架下,如果一国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世界秩序,那么该国就能直接实现意象差距的缩小化,如冷战后的美国;如果不能,那么该国的意象差距就会维持不变,如冷战后的日本,或呈扩大化趋势,如冷战后的俄罗斯。如果一国必须通过彻底颠覆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才能将理想意象兑现为现实意象,那么该国就不能直接实现意象差距的缩小化,而且在此之前必然有一个意象差

距扩大化的过程。例如,希特勒德国想把当时由英法主导的世界秩序变为它想象中的德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尽管德国有可能通过改变现实使之适应理想意象来缩小其意象差距,但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德国的意象差距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扩大化过程,甚至扩大到现实意象与理想意象无法调和的程度。

就第二种方式而言,如果一国能够基于合法性认知接受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那么该国就能够使理想意象适应现实意象,从而不断缩小自己的意象差距,如二战后的英法;如果只是基于外力胁迫才接受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甚至拒绝接受),那么该国就不能使理想意象适应现实意象,也就不能缩小意象差距,如一战后的德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接受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这种接受不会直接改变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现实意象和理想意象,因而不会马上带动意象差距的变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接受会向基于合法性认知的接受转变,如欧洲各国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意象调整,或向基于外力胁迫的接受(甚至拒绝接受)转变,如德国1871年统一之后对欧洲均势秩序的意象变迁,前者将导致意象差距缩小化,后者则导致扩大化。^①

因此,重要的不是以何种方式调整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而是调整的过程和结果,即意象差距呈缩小化还是扩大化变动趋势,这才是判断一国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对世界秩序持何种态度的根本标准。由于国家主观上缩小意象差距的尝试,客观上可能形成意象差距缩小化和扩大化两种不同的结果,从而对世界秩序采取现状取向和修正取向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因此,不能直接从国家旨在缩小意象差距的努力,即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的情况,来判断该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态度,而必须通过具体考察这种努力对该国意象差距的变动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加以判断。

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形成于该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是多方面的,战争和外交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维度。一国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进行国际干涉,还是通过外交手段协调国际矛盾、融入国际制度,是考察该国参与世界秩序的基本线索。一般来说,一国如果以军事参与为主,或强调军事参与优

^① 这里借用的是温特对国际规范化途径与等级的分析,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49页。

于外交参与,那么该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往往呈扩大化趋势变动;反之,则呈缩小化趋势。

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具体可以区分为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国家实力的提升,后者表现为国家的社会化,即对国际规范的接受和内化。国家在两个方面都受益,或者虽然没有取得物质性成长但却获得社会性成长时,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会趋向于缩小化;如果只有物质性成长,而没有社会性成长,那么这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就会趋向于扩大化,它极有可能成为现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器物层面上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在观念层面上对国际规范的建构。如果一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国际规范的建构与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是相容的,换言之,如果一国能够在现行世界秩序基本结构和规范的框架下,发挥较大的于己有利的积极影响,那么其意象差距就会发生缩小化趋势的变动。反之,如果不能,或者一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国际规范的建构与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是背离的,那么其意象差距的变动就会趋向于扩大化。

但是,不论参与、受益,还是影响,任何单个方面都不足以让我们对一国意象差距的变动趋势形成确切的判断。例如,一个潜在的霸权体系的挑战国一开始很可能实行搭便车的随强战略,通过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并从中受益以累积实力,这时,这个国家的意象差距会呈缩小化趋势变动。而一旦它的影响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它很可能不满意现存的世界秩序,反而想取代旧霸主,重新确立一种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那么这时,这个国家的意象差距不是进一步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因此,必须将一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判断该国意象差距的性质(可调和还是不可调和)、程度(高还是低)和变动趋势(扩大化还是缩小化)。

在参与、受益和影响三个判断指标中,受益中的社会性成长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国家在社会性成长方面的受益情况,不仅决定国家物质性成长对于世界秩序的寓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参与和影响。社会性成长顺利的国家倾向于强调外交参与优于军事参与,社会性成长没有显著进步的国家则恰恰相反。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国际规范的建构,有时一致,有时背离。也就是说,有的国家能够左右国际体系的结构,但却对国际规范的建构没有贡献,而有的国家虽不能在塑造国际体系方面发

挥影响力,但却有助于国际规范的建构。其关键性的区别在于国家的社会性成长不同。前者缺乏社会性成长,因此意象差距难以缩小;后者社会性成长能够有所成就,因此意象差距易于缩小。通过随强积聚实力并最终倒戈的修正国,其意象差距之所以随参与的增加和实力的扩张反而扩大,就是因为没有同时实现社会性成长。因此,国家在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在实现物质性成长的同时,能否实现社会性成长,是判断该国意象差距变动呈缩小化还是扩大化趋势的重要指标。对于新兴的崛起国而言,尤其如此。

三、意象差距的变动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军事参与和外交参与

本文接下来考察建国以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并据此判断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性质、程度和变动趋势。在从1949年至今的近60年时间里(中国人俗称一个甲子),中国受到两个重大事件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1989年冷战的结束,据此可将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自建国以来中国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频率和幅度呈明显下降的趋势。1949年以来中国参与的主要国际武装冲突,大多集中在冷战期间,尤其是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而且,中国卷入国际冲突都是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1953年朝鲜战争)或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中印、1969年中苏、1979年中越三次边界战争)时做出的迫不得已的抗争之举。

与建国初期强调不惜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后,中国越来越重视通过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中国已经在冷战后时代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了大部分领土争端,并为以同样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奠定了重要基础。^①即使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

^① Jianwei Wang, "Territorial Disputes and Asian Security: Sources, Management, and Prospects,"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80—423.